

现代风险管理译丛

Ortwin Reun

奥尔特温·雷恩
Bernd Rohrmaun
伯恩德·罗尔曼·译校

跨文化的风险感知

C 经验研究的总结

Cross-cultural Risk Perception: A Survey of Empirical Studies

◎译者
赵延东
张虎彪

Cross-cultural Risk Perception: A Survey of Empirical Studies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GROUP)
北京出版社

现代风险管理译丛

跨文化的风险感知

C经验研究的总结

Cross-cultural Risk Perception: A Survey of Empirical Stud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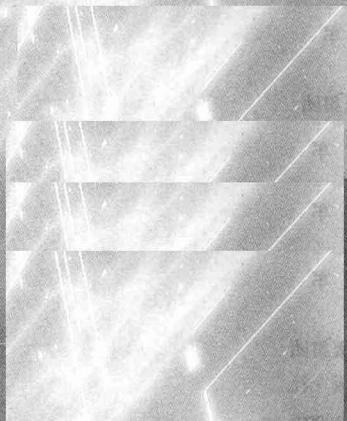
奥尔特温·雷恩 伯内德·罗尔曼◎编著

Ortwin Renn Bernd Rohrmann

赵延东 张虎彪◎译

F 272.3

L 26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GROUP)

北京出版社

Cross-cultural Risk Perception: A Survey of Empirical Studies By Ortwin Renn and Bernd Rohrmann

Copyright © 2000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being a part of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All rights reserved

© 2000 年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经作者授权,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 - 2007 - 200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文化的风险感知:经验研究的总结/(德)奥尔特温·雷恩(Ortwin Renn),
(澳)伯内德·罗尔曼(Bernd Rohrmann)编著;赵延东,张虎彪译。—北京:北
京出版社,2007.4

(现代风险管理译丛)

ISBN 978 - 7 - 200 - 06811 - 5

I. 跨… II. ①奥… ②伯… ③赵… ④张… III. 风险管理—研究 IV. F2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1084 号

现代风险管理译丛

书名 跨文化的风险感知:经验研究的总结

KUA WENHUA DE FENGXIAN GANZHI: JINGYAN YANJIU DE ZONGJIE

编著 (德)奥尔特温·雷恩(Ortwin Renn),(澳)伯内德·罗尔曼(Bernd Rohrmann)

译者 赵延东 张虎彪

责任编辑 欧阳向英 王军

原文出版 Kluwer

出版发行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出版社

网址 <http://www.bph.com.cn>

地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编 100011

印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1.5

字数 245 千字

版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200 - 06811 - 5/F · 358

定价 25.00 元

质量投诉电话 010 - 58572393

京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现代风险管理译丛》 编委会名单

顾 问：刘燕华

主 编：靳晓明 王 元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缨 王奋宇 龙 杰 史培军 李秀斌 李培林
何光喜 张 健 金 炬 罗德隆 姚为克 赵延东
钟制宪 费多益 黄 平 蔡嘉宁 薛 澜

总序

卡特琳娜飓风、印尼海啸、非典型性肺炎、“9·11”恐怖袭击事件……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后不断出现的种种灾害和意外无一例外地警示我们：风险无处不在，一个以风险为特征的新型社会形态正在来临！

为了更好地把握现代社会的本质，以德国社会学家贝克（Ulrich Beck）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提出了“风险社会”（risk society）的概念。他们指出，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全球化的扩展，人类社会已经开始进入一个“风险社会”时代。与传统风险相比，现代风险在本质、表现形式和影响范围上已经有了很大不同，它们更难预测、更难捉摸，并且影响的范围更加宽广，带来的破坏性更为严重。更为重要的是，风险社会的到来导致了社会理念基础和人们行为方式的改变：对增长的盲目乐观必将被更加审慎和全面的发展观所取代；过去的经验已不足以成为当前行为的依据和理由，人们当前的行为选择同时还受到对未来预期的影响。可以说，现代风险已经从制度上和文化上改变了传统现代社会的运行逻辑。

这种别具一格的视角，为人们更好地理解当今社会并制订相应的制度和政策提供了独特的参考价值。人们日益认识到，在现代社会中，国民经济的良性运行，社会政治的和谐稳定，文化科技的繁荣发展，都离不开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和系统的治理手段。而“风险社会”的来临，对传统的风险管理机制又提出了新的挑战。建立符合风险社会需要的新型风险管理体制，已经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在此理念的指导下，许多西方学者就现代风险

的性质和特征，以及对风险的预防、评估、识别和治理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作为一个处于高速发展和社会转型过程之中的大国，中国面临的风险管理任务更为严峻。首先，在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越来越多的现代风险成为超越国界的议题，中国作为“地球村”的一员无可避免，但与此同时，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还必须面临许多在工业化国家中已经基本得到遏制的传统风险。其次，与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面临着更为紧迫的经济发展任务，但发展经济本身却可能带来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使得我们更有可能面临新的风险冲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同时面临着发展经济和控制风险的双重任务。

但现实情况却是，我国的教育和科技发展水平还相对落后，对于现代风险仍然缺乏足够的知识与管理能力。尽管我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风险的管理工作，并在各个专门领域都建立了针对重大风险（灾害）问题的管理和应对机制，但总体而言，我国现有的风险管理体制还不够完善，难以满足新形势下风险管理的需求。

完善的风险决策和管理体制，必须以坚实的研究为基础。目前国内的风险和风险管理研究仍然处于起步的阶段。多数相关的研究工作主要还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集中于对各类具体风险（灾害）问题的分析，而对现代风险的本质及其管理方法的认识还不够充分。特别是从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视角出发，研究风险的社会影响及其治理的研究尚不多见。

在我国科学技术部的支持下，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了“科学技术与现代社会风险”研究课题组，致力于对现代风险和风险治理的总体性的研究。课题组认识到，现代风险是一个多维度的社会现象，除了自然科学维度外，同时还关系到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心理问题和管理问题。因此，课题组希望发挥研究组的核心作用，同时利用国内外的学术网络，结合社会科

跨文化的风险感知：经验研究的总结

学、管理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力量，统合国内现有的专门领域的风险（灾害）研究，以把握现代风险的本质与发展规律和风险管理的一般原则与方法，并以此希望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特定的风险研究范式。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译丛的选编出版正是研究组尝试工作第一步。译丛选编的书目涵括了社会科学、管理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则正是对研究组上述认识的体现。我们希望本译丛的出版，能对推动我国的风险研究工作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并对完善我国的风险管理体制有所裨益。

编者和撰稿人目录

奥尔特温 · 雷恩

巴登 - 符腾堡州技术评估中心理事会主席，斯图加特大学环境社会学教授。他的职业生涯包括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克拉克大学担任六年的环境、技术和社会系副教授，还在苏黎士的瑞士技术研究所（瑞士）担任过访问教授。雷恩获得了社会学、经济学的硕士学位和社会心理学的博士学位，两个学位都是克拉克大学（经济学和社会科学院）授予的。他目前的研究包括风险感知、风险沟通、区域可持续性发展的概念、风险管理中的公众参与。雷恩出版了 14 本著作，发表了 80 多篇文章。除此之外，他还服务于德国政府的环境变化咨询委员会、巴登 - 符腾堡州未来委员会、欧洲科学技术变迁研究所。1996 – 1997 年雷恩还担任欧洲风险分析协会的负责人。

伯内德 · 罗尔曼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高级讲师和德国曼海姆大学的助教。

他于 1974 年在汉堡大学社会科学系获得博士学位；1983 年在曼海姆大学的心理学系获得教授资格；1992 年以来生活和工作在澳大利亚。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应用社会研究，环境心理学和研究方法论。主要研究兴趣：风险感知/沟通/管理；环境刺激的影响（如噪音）；危害评估和灾难预防；住所的选择和满意；决策过程和决策辅助技术；教学质量。他对方法论的兴趣：回答率、调查方法、评估研究和结构模型。他还担任政府机构、法院和公司的顾问工作。发表约 120 篇文章/报告/章节/著作。

保罗·斯洛维奇

俄勒冈州大学决策研究的负责人和心理学教授。主要研究人类判断、决策的制定和风险分析。他在斯坦福大学获得了学士学位，在密歇根州大学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在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获得了荣誉博士。他曾经是风险分析协会的负责人，在1991年获得了特殊贡献奖。在1993年被美国心理学协会授予特殊科学贡献奖。在1995年被俄勒冈州科学院授予突出科学贡献奖。

詹姆斯·弗林

俄勒冈州尤金决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公众、社区和制度对科学技术的反应，特别着重于那些对人类健康及环境有着特别影响的科学技术的研究。他的研究领域是风险沟通、风险管理和社会政策。他的研究集中于核技术（包括核能、放射性废料、核原料的运输等）和公众对核武器的反应。在过去的十年中，他发表了40多篇论文，参加了50多项研究。这些研究绝大部分是建立在调查数据的基础上。他是美国公众舆论研究委员会和风险分析协会的成员，还服务于风险评估和政策协会的理事会。他大学本科毕业于东部的华盛顿州立大学，在华盛顿大学完成了他的研究生课程（硕士，博士）。

C. K. 默茨

自1991年以来一直是决策研究所的数据分析师和管理者。她通过分析实验和调查数据来支持组织行为正在进行的判断和决策研究。她正在实验多变量统计方法（包含协方差结构模型）。除此之外，她在社会经济影响分析和农村社区规划方面有相当丰富的经历。她是储藏在内华达州尤卡山的高放射性废料的社会经济影响研究的管理和执行小组的成员，这个研究主要从事在南部内华达州的大量核废料储藏对农村和社区的社会经济的全部影响，包括经济的和人口学的、社区设施和服务、财政的、政府间的关系、社会文化的和风险效应等。

默茨女士准备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包括为美国陆军工程兵部队

跨文化的风险感知：经验研究的总结

和美国土地管理局准备而对西部的科罗拉多州的油页层进行社会经济影响的评估。默茨女士于 1973 年获得了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的学士学位，1981 年获得堪萨斯州立大学授予的地区和社区规划的硕士学位。

马克·普马雷德

卡尚高等师范学校从事风险管理与沟通的副教授，也参加了风险、信息和决策方面的研究群体（GRID）。研究领域包括：

安全实践和文化，（如存在于核能工厂和军事制度中）新的和复杂技术对人类的影响

法国公众在国内和国际上卷入风险事件的性质和动力

大量人口对核工业减少信任在个人和组织表现的结果

社会因素有助于加强或减轻在社区内风险事件的感知

马克·普马雷德曾经担任欧洲风险分析协会负责人，服务于政府和欧洲的咨询委员会。

莱雷尔·梅斯

她是自 1982 年以来在法国生活和工作的社会心理学家（美国哈佛大学，1981 年获得文学士；于 1985 年在巴黎第八大学获得专业硕士学位）。1984 年，西姆罗格研究所（SYMLOG，一个私人研究咨询公司）被一个法国核能工厂的管理者召集来创造一个员工安全的参与项目——这个项目考虑群体行为规范和安全文化。这个时候她就开始接触核领域。这个干预在风险感知上产生了兴趣。风险感知好像从群体之间和如何进行风险沟通上都呈现不同。

从社会中的风险沟通视角看，通过比较公众信息在英国和法国的实践，随着欧盟委员会（CEC）的合同法的实施，放射性废料管理的议题在 1990 年成为焦点。梅斯目前（1999—2000）被美国科学院全国研究会任命为放射性废料提案委员会的筹划指导委员。

梅斯是《欧洲应用心理学评论》（双语季刊）的编辑。她曾

经当选为欧洲风险协会秘书（1999—2000）。梅斯在工作中的主旨吸引了制度学派的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公众中的个体成员可能如何经历风险的理解。

尤根·罗沙

目前他是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机构的环境及自然资源政策的教授、社会学讲座教授、社会和经济科学研究中心合作教授、环境科学和地区规划项目的兼职教授。这些机构都属于华盛顿州立大学。他还担任美国科学促进会社会、政治和经济科学分部的秘书。他的研究项目集中于对环境主题（尤其是能源、技术和风险议题）进行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关注。他调查研究了能源消耗水平和社会幸福水平之间的关系、公众对能源问题和政策的意见、影响太阳能技术采纳和能量守恒实践的因素、公众的态度取向和核能及核政策的接受、最近是跨文化的风险感知、在这些研究领域，罗沙著述颇丰，备受称赞。他最近的研究聚焦于风险的认识论和全球的环境变化。

松田

主要研究领域：风险感知、决策支持和分析。

克林赫瑟林克

范库弗峰华盛顿州立大学副教授、环境心理学和地区规划系主任。1980年在华盛顿的美国心理学协会做访问科学家，1986年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做访问科学家。克林赫瑟林博士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获得了两个教学奖。1995年他还获得了来自金钥匙国家荣誉协会的年度学术咨询奖。1988年从普尔曼校园转向范库弗峰校园，他担任社会科学的助理、心理学的助理、公共事物的理事、心理学的助理主席。除了研究跨文化的环境风险感知外，他的研究还包括对信息的聚焦注意力、人际吸引、社会性别差异和自我概念/自我效能等的研究。他在1971年获得爱荷华州大学授予的社会/个性心理学博士学位。

舍贝里

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风险研究中心主任、风险研究协会研究员。他是《风险研究杂志》的助理编辑、《风险分析》（一个国际期刊）编委会成员。从 1970 年以来，舍贝里教授一直在从事风险感知及相关议题的研究。

克拉罗娃

索非亚大学社会心理学和社会生态学讲师。去年，克拉罗娃博士参与了几个国际上的关于风险感知和风险沟通的研究方案。在 1996—1997 年，她参与欧盟援助的“恺撒项目”——一个在六个中部和东部的欧洲国家实施的，关于环境健康、公众的风险感知和风险沟通项目，是该项目风险感知、环境和沟通战略方案在保加利亚的负责人。

中文版序言

本书的目的是介绍一些对比不同国家的人们对风险的态度和评价的风险国际比较研究，书中主要介绍了四项经验研究：

- 美国与法国的风险感知研究，斯洛维奇等人；
- 保加利亚与罗马尼亚的风险态度（以瑞典为参照系）研究，舍贝里等人；
- 澳大利亚、德国和新西兰（第一轮）和中国与澳大利亚（第二轮）的危险感知研究，罗尔曼；
- 美国和日本的风险感知的认知架构研究，罗沙等人。

表1是对这四项研究的概述，表中列出了每项研究的抽样方法，包括的国家以及主要的自变量与因变量。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四项研究都在因变量的定义和区分上花费了大量的精力。风险感知的早期研究大多使用单一的风险感知量表，而近期的调查（包括本书中涉及的调查）则开始意识到风险感知过程的复杂性，因此变得更为审慎。在风险感知的研究文献中，区分个人（包括被访者自己及其亲友）对风险的感知和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对风险的感知已经成为一种标准化的程式。不仅如此，在确定与风险感知相关的语义空间时，研究者也使用了越来越多的目标变量，如对收益的感知、风险的特征、对风险大小、概率（严重性）的感知、感知到的威胁以及对健康的影响等等。

四项研究中使用的自变量都是比较经典的心理测量学变量、意识形态背景和世界观变量等，包括在《社会科学视角下的风险

可接受性》以及其他出版物^①中使用过的四种文化原型、情感或焦虑、社会-经济地位、职业归属、信任等等变量。

与因变量的情况一样，对自变量的处理也变得日益复杂。而与此同时，随着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过去那种简单化的风险感知模型开始受到挑战。本书中涉及的这四项研究以及此前其他相关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都充分证明：有关人们的直觉风险感知根源在于人类的非理性的说法，以及有关一般性风险特征决定了风险感知的说法，都无法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

表1 研究项目概述

研究	样本	国家	自变量	因变量
斯洛维奇等人	总体人口的随机样本	美国、法国	定性风险特征、文化原型、情感水平、人口学特征、国家	风险规模大小、个人和社会的收益、可接受性
罗尔曼研究一	特定群体（生态主义、技术主义、金钱主义、女性主义取向）	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认知信念、其他态度、群体构成、国家	风险评价（包括规模、对健康的影响、毁灭性潜能、收益、个人和社会对风险的接受程度）
罗尔曼研究二	三个学科的学生、科学家	澳大利亚、中国	同上	同上
舍贝里等人	特定群体（护士、经济学与商学院的学生、技工、无家可归者）	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瑞典（以巴西作为参照）	性别等人口学特征、焦虑、对风险信息源的信任、国家	风险规模大小、对降低个人及社会风险的需求以及其他
罗沙等人	学生	美国、日本	年龄、性别、心理学特征	个人及社会的风险感知

^① Douglas, M. (1985), Risk acceptability according to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另参见 Schwarz, M. and Thompson, M. (1990), Divided we stand: redefining politics,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oic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研究一：斯洛维奇等人的研究旨在更好地理解人们对核能的态度。它比较了法国与美国这两个国家，发现了两国之间存在的许多共性和差异性。

有两个共性特别值得一提。

其一，与人们普遍的看法相左，法国受访者对核能危险本性的关注程度丝毫不亚于美国受访者。尽管核能在法国发展甚快而且在政治上受到大多数组织和机构的欢迎，但许多法国受访者还是把核能及核废料列为“风险最高”。在两个国家中，人们对核能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安全、健康和环境质量等议题上。尽管风险感知在两个国家中都是预测公众对核能态度的有力预测因子，但它不能完全说明两国对核能依赖程度的水平差异。两国对核能态度的结构与方向似乎是非常相似的。

其二，两国的女性对核能的态度更具批判性。进一步的分析表明，约30%的美国白人男性和略高一点比例的法国白人男性与其他受访者群体表现出明显不同的特征：他们对危险的感知明显比其他人低，而对核能的支持明显比其他人高。与之相应地，研究者发现在美国的黑人男性中，风险倾向明显偏低。斯洛维奇等人的结论是存在一个“白种男性亚文化”，其特征为风险倾向高、拥护技术、支持经济发展、相信科技进步会带来好处、相信冒险是财富之源等等。这些人一般有更高的收入、更高水平的教育，持更强的权威主义和反平等主义态度。他们还更信任专家。如果把这个群体从分析中剔除，则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异就几乎消失了。

国家之间的差异同样明显。法国人认为核能有很大的社会需求，他们期望通过核能可以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他们更信任科学家、产业界和政府官员，并相信应该由政治家和专家们而非受核能影响的普通公众来做出有关核能的决策。美国的受访者则表现出对专家更不信任，更倾向于支持公众直接参与决策，而且要求对决策过程施行更民主的控制。

很明显，法国与美国公众之间存在的差异不是根源于对风险和收益的评估，而应追溯到对两种政治文化的评价与实践。大部分法国受访者对依赖于专家意见和官僚理性的中央集权政治决策实体比较有信心。在法国的风险管理要获得合法性，就需要证明已经咨询了最好的专家，而且有机构愿意为一些偏离决策初衷的后果承担责任。

这种以信任为基础的关系与美国文化大相径庭。在美国，人们要求在决策过程中更多地考虑公众的偏好。除此之外，他们不相信政府机构是诚实的，不相信政府机构的成员可以有效地管理好与公众安全、健康和环境的事宜。因此，美国公民期望官员们能充分考虑那些公众认为是危险的事物，并根据公众表达的偏好来采取行动。

这一研究还检验了文化原型在解释风险感知中的效度和适切性。研究结果表明：我们很难用这四种原型将人们做出完全的分类，认定某人是属于某一原型而非另一原型。相反，这些原型的理念总是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个人。这些理念实际上是与风险感知有联系的，这一点在美国的表现比在法国更明显。数据表明，那些支持权力与财富分配更为平等的平等主义社会的人们更倾向于反对核能，而那些支持个人主义态度和等级制社会系统的人们则更倾向于支持核能。

研究二：本书的第二项研究强调了文化变量对风险感知的影响，它调查了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中国的风险感知情况。罗尔曼在研究中并未采取随机抽样方式，而是聚焦于某些社会群体和职业群体。在第一轮研究中，他调查了那些有技术倾向、金钱至上倾向、生态主义倾向和女性主义倾向的群体。在第二轮研究中，受访者是心理学、技术研究和地理学专业的学生和科学家。

尽管罗尔曼发现在不同国家以及四个群体之中存在相当多的跨文化差异，但他还是警告说，如果要用这些数据来证明斯洛维

奇等人在研究中证实过的文化原型，必须慎之又慎。在各样本和四种文化原型中存在一些共同性，而对于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异，罗尔曼是用制约着群体成员行为和态度的职业价值和世界观来解释的。

令人相当吃惊的是，第一轮研究中的大多数变量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还不如在同一国家内部四个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来得显著（在包括了中国的第二轮研究中，国家之间的差异要比群体之间差异更显著一些）。这一结果进一步说明，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认同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国际化的职业认同所取代。

罗尔曼指出：无论在哪个国家和哪个群体，在人们所担心的众多危险之中，总有几个会被人们认为是更为严重的。这些“顶级”风险包括核能、石棉和抽烟。另外在不同国家受访者对风险的排序中也有些值得注意的情况。各国对这些风险的暴露情况以及对这些风险的重视程度可以解释大部分（风险排序）的方差。但是，如果我们据此假设风险感知不过是镜像式地反映了由风险评估所揭示的风险水平的话，那将是误导性的。罗尔曼证明了与流行病学的数据相比，人们对许多风险的感知要么是过分夸张了，要么是不够警惕。这一发现在两个国家中都有所表现。

对中译本的读者来说，中国的数据可能是特别有趣的。中国的受访者们对大多数危险的风险评定分都是相当低的，至少从个人的可接受性来说是这样（社会可接受性略有不同）。一个对中国知之甚少的旅游者或许会做出相反的猜测，中国文化更多地建基于集体主义和个人奉献之上，而非建基于个人主义和自我实现之上。但研究中国文化的专家们强调说：中国的决策者们特别不愿意冒险，由于集体决策的决策者们一般都有风险规避的倾向，高风险的建议很可能会被拒绝。

我们还可以把这一结果与斯洛维奇等人的研究联系起来看：法国人对官员的信任是因为他们相信这种信任可以换来使自己更少暴露于风险威胁之下的保证。中国的情况可能也有些与此相似